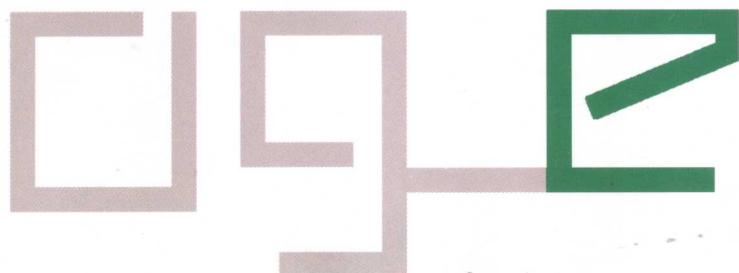




D i a l o g u e



高罗佩：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

张 萍 / 著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高旭东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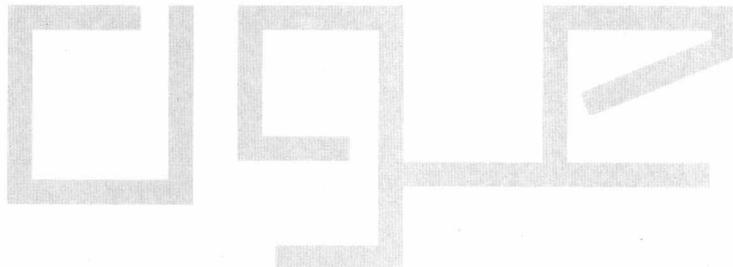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K835.635.81

1



D i a l o g u e



高罗佩：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

张萍著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高旭东 主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罗佩: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张萍著. - 北京:中华书局, 2010. 8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7396 - 6

I . 高… II . 张… III . ①高罗佩(1910 ~ 1967) - 人物研究②文化交流 - 研究 - 中国、西方国家 IV . ① K835. 635. 81②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4341 号

书 名 高罗佩: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
著 者 张 萍
丛 书 名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责任编辑 张彩梅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1/8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396 - 6
定 价 30.00 元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顾 问：乐黛云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佛克马 欧洲科学院院士

前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

主 编：高旭东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
北京市比较文学重点学科带头人

本书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专项资助”
(此项目为北京语言大学高旭东教授主持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个案研究”)

本书同时受到清华大学外语系 985 经费资助

总 序

文学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由于异质于西方文化的东方各国的介入,比较文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比较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来,中国在文学与文化上的对话与比较意识是在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被逼出来的;而今,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姿态,中国主动认同文化的多元化,并且以多元之中的一元寻求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作为跨文化的文学对话,首先应该寻找二者之间的共同话语,否则,对话就没有契合点,就会各说各的。钱钟书、叶维廉、刘若愚等学者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随着对话的深入,跨文化的中西文学展现出来的更多的将是差异性,甚至一些基本概念也具有不可翻译性。因此,如何站在当代学术的前沿,对中西文学进行整合,并从中概括出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文学”,将是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的主旋律,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宗旨。

我们这套丛书也有拨乱反正的意图。一般来讲,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与交融,有一个规律性的过程,就是从一厢情愿的生搬硬套到较为客观的对话与比较。譬如,佛教初入中国,一般人就以道家的语汇去生搬硬套,后来才发现佛学与道家的差异。

遗憾的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已有几个世纪了，我们仿佛还没有走出文化认同的生搬硬套的“初级阶段”。在历史学与社会学领域，西方社会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演进模式，被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在哲学上，西方的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也成了剪贴中国哲学的一套现成的方法。而文学上的生搬硬套更是无孔不入：屈原、李白被说成浪漫主义者，《诗经》与杜诗则被说成是现实主义的，在对中国叙事文学的阐释中，西方的典型、类型、悲剧、喜剧等概念简直是铺天盖地，结成一张生搬硬套的大网，使我们的受教育者无法从这张谬误之网中逃遁。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先觉的学者开始批判反省这种生搬硬套的学术模式，但时至今日，这张谬误之网仍在遮蔽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真面目，使之难以恬然澄清，将特点呈现于受教育者之前。试想，《诗经》是中国抒情诗传统的正宗，是使中国文学在源头上就与西方形成的史诗传统不同的开山之作，而将之说成是现实主义作品，岂非有意遮蔽中国古典文学的特点？因此，以跨文化的文学对话来取代这种生搬硬套模式，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搬硬套模式的生成与文化选择的取向并无必然的联系。胡适是“全盘西化”论的倡导者，但他却在戴震那里发现了“实验主义”，在王莽那里发现了“社会主义”。郭沫若既尊孔又推崇庄子，但他与胡适一样，在孔子那里发现了康德与歌德之人格，在庄子那里发现了“泛神论”，并以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模式来套中国古代社会。而鲁迅与梁漱溟，虽然一个具有浓重的西化倾向，一个以为世界最近之将来必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但是二者的共同之处，则在于对中西文化和文学的差异有清醒的认识。鲁迅西化的文化选择取向并没有使他把西方

的话语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中来。他从来没有用“封建主义”等西方词汇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也没有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他指出中国没有“悲剧”观念，对于林语堂得意洋洋地将 humor 译成“幽默”并在中国文学中寻找“同党”也不以为然。1932 年，针对日本人要编《世界幽默全集》，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所谓中国的‘幽默’是个难题，因‘幽默’本非中国的东西。也许是书店迷信西洋话能够包罗世界一切，才想出版这种书。”“中国究竟有无‘幽默’作品？似乎没有。”^①就此而言，鲁迅较之生搬硬套的同代人，显然要清醒得多。可以说，生搬硬套体现了文化碰撞之初对异质文化的认同性变异。因为人们对于陌生的对象，往往喜欢从自己已有的经验去想象它；而另一方面，则是媒介者考虑到本土的便于接受而故意“误读”，就像近代那些“豪杰译”，将西方小说翻译成中国式的章回小说一样。而我们的这套丛书，就是想在纠正这种生搬硬套的学术研究模式上有所贡献。

在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另一种研究倾向是对“中西”概念的颠覆与取消。一些学人认为，“中”与“西”不是对等的，“西”有许多国家，法国与德国、英国不同，与美国更不同，把这么多不同国家的文学放在一起与中国文学比较，有什么科学性？能够把法国一个历史阶段产生的文学研究好就很不错了，现在居然将西方那么多国家的文学与中国文学相比，又有什么科学性？

先看“中西”这个概念有没有使用的有效性。事实上，非但“西”有很多国家，即使“中”也不尽相同——中原文学与楚文

^① 《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99页，第485页。

学、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但是，无论是中原文学还是楚文学，无论是南方文学还是北方文学，都祖述尧舜，都深受儒家与道家文化的影响并且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大的方面说是一个大文化统一体之内的文学。西方虽然国家众多，但是这些国家都祖述希腊、罗马的遗产，中古以降都以基督教为国教（尽管又有罗马公教与东方正教的差异，有天主教与新教的差异），在现代都面临着“上帝死了”的文化困境，因而也是一个大的文化统一体。正如韦勒克（R. Wellek）所说的：“西方文学是一个整体。我们不可能怀疑古希腊文学与罗马文学之间的连续性，西方中世纪文学与主要的现代文学之间的连续性。”^①而将中国和西方这两种大文化中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是真正跨文化的文学对话。至于是研究一个国家的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好，还是研究“总体文学”好，这要看各人的本领。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可以研究得很细很深，也可能研究得琐碎平庸；研究“总体文学”可能大而无当，空疏浅薄，也可能成为康德、海德格尔式的学术大师。比较而言，理论大师皆出自后者，细密的专家则多出于前者。尽管如此，我们一向反对“比漂”——即古今中外，天马行空，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不深入。我们希望的是扩出去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收回来要成为一个研究专家。这也是我们对于这套丛书作者的期待。

这套丛书得到了北京市重点学科基金的资助。我们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促进学科发展与学术繁荣的用心，对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对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关怀，对国际知名学者佛克马教授对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关心，表示深深感谢。

^①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44页。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王宁教授虽然已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学术带头人,但他作为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和博士生导师,对这一重点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书局的张彩梅女士对于学术的热忱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们深深感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忱。

高旭东

2006年1月16日于北京天问斋

序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疆界的不断扩展以及与文化研究的相互融合,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学者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新课题、新术语和新的研究范畴,从而使得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比较文化的特色。而在这样的“比较文化”研究中,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出研究者应有的深厚文学功力和多学科、跨文化知识背景,我认为这恰恰是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说实话,我本人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发表的著述就带有这样一个特色,因而我所指导的研究生也就自然而然地继承了我的研究视野和方法。

本书作者张萍原先是学外语出身,硕士阶段学的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因此在英语的阅读和写作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由于她本人的刻苦努力和用功,同时也由于一流大学的教学对人才的高要求,她也必须和她的不少年轻同事一样,利用业余时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于是她经过努力于2004年考入北京语言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我当时虽然早已离开了语言大学,但仍在那兼职指导博士研究生。虽说她报考的导师是我,但进校后的指导教师却同时是我和高旭

东教授，主要担负指导任务的是高旭东教授。她和擅长中国文学研究的高旭东教授商定了以荷兰学者高罗佩的著述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我们确实曾有过担心，一来我们自己对这个题目并不太熟悉，二来这对于以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为硕士专业的张萍来说，不啻是重新学了一个新的专业。其中要付出的辛勤劳动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当她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出开题报告时却受到了全体考试委员的认可，更令我们惊奇的是，她居然克服了种种工作上和家庭中的困难，按时于三年之内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且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这使我们感到欣慰。

确实，在当今这个学术不景气的商品经济时代，不少青年学生拿到博士学位就以为万事大吉了，或者弃学经商或改行从政，或者一辈子吃老本，不求进取。而张萍却不是这样的人。她继续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和家庭事务之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将博士论文修改扩充成一部分量厚重的专著，从篇幅来说等于她原先论文的一倍，而从内容来说则大大地丰富了，其中有些研究，如讨论高罗佩对中国古琴的研究可以说开了国内这方面研究之先河，而对高罗佩的房中书的深入研究和讨论则明显地超越了现有的研究成果。所以当我远在英国访学时，张萍请我为她的这本即将付梓的专著撰写一篇序言时，我就欣然同意了。

如果从读她的博士论文算起，我是第三遍通读本书，每一次通读都发现她的新进展和新见解。我认为，本书以荷兰汉学家，或业余汉学家高罗佩的《狄公案》系列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了高罗佩的文化翻译对传播中国文化的贡献以及对翻译理论本身的贡献，带有明显的文化研究的色彩。众所周知，侦探小说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在传统的精英主义比较文学学者那里是不受重视的，但她却从中发掘出了理论批评价值和文化研究的

价值，并据此对翻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正如她所正确地指出的，在考察和比较《狄公案》系列小说的中译本与原文的差别时，我们几乎很难把这个中文版本看成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文本，倒更像是勒菲弗尔所称之为的“改写”文本。但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却是，在西方广受欢迎的《狄公案》系列小说，正是在两位中国译者陈来元和胡明的努力下，不仅顺利地回到了故乡、没有出现水土不服，而且在广大中国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读中文译本时，很多读者根本想不到这是一个外国人创作的关于中国古代人物的小说。因而可以说，两位中国译者的“改写式”翻译预示了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当然，若按照本雅明等解构翻译理论家的说法，一部未经翻译的原文本也许是处于“死亡”的状态，正是译者的翻译才使得这部原作具有了连续的生命或曰“来世生命”。这在本书所讨论的个案中明显地得到了印证。虽然中文译本与原文本存在一些差异，但作为通俗文学文本，无论是原文本还是翻译文本在各自的读者群中都取得了广泛的认可，因而其文化传播的效果十分明显，似乎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成功的文化翻译。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还以此为据，提出了中国文化在全世界传播的一些具体策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诚然，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本书还涉及对通俗文学的翻译进行的研究，既跨越了语言的界限，同时也跨越了文化和学科的界限，我想，如果没有扎实的中英文功底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张萍的学术道路同时也向我们不少从事外语教学的青年教师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充分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背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努力将其介绍到世界，从而彻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使得一个新的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格

局出现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

在当前通俗文学空前繁荣而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却极其薄弱的时代，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自然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它充分显示了作者打破学术樊篱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也突出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意义。本书还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翻译问题，从文化翻译角度来看，通俗文学的翻译研究既非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研究，也非精英式的文学研究，而是一种超越了语言/文学二元对立的广义的文化研究。它充分表明，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因素不仅可以拓展传统的翻译研究领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进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最终实现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相互借鉴和沟通。可以说，她的这一宏大目标已初步实现。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将对上述诸学科领域的学者有所启发，同时也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王 宁

2008年7月于英国剑桥

目 录

序	王 宁(1)
一 高罗佩及其文化实践	(1)
(一)高罗佩生平	(1)
(二)高罗佩文化交流活动的针对性和关联性	(3)
二 高罗佩研究的现实意义	(10)
(一)当前的文化语境和文化走向	(10)
(二)高罗佩文化实践的意义	(11)
(三)高罗佩研究的现状	(19)
(四)本书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	(39)
(五)本书所研究文本的版本说明	(40)
三 关于高罗佩文学翻译实践的研究	(43)
(一)文化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43)
(二)高罗佩对待翻译的态度	(50)
(三)翻译的选材	(52)
(四)翻译的结构调整	(55)

(五)统一叙事角度	(58)
(六)避免道德说教	(60)
(七)考量艺术效果：简洁与悬念	(61)
(八)中国文化参照	(67)
(九)关于《狄公案》中译本文化翻译策略与实践的分析	(71)
(十)小结	(84)
四 《狄公案》的叙事特点	(87)
(一)分析材料的选择	(89)
(二)主要情节的设置	(91)
(三)文本的比较分析	(92)
(四)小结	(110)
五 《狄公案》的人物塑造	(112)
(一)《狄公案》中的狄仁杰	(113)
(二)《狄公案》中的助手们	(130)
(三)《狄公案》中的女人们	(144)
(四)小结	(164)
六 《狄公案》的世界观与文化观	(166)
(一)《狄公案》中的鬼神观	(166)
(二)《狄公案》中的爱情观	(189)
(三)《狄公案》中的法制观	(201)
(四)小结	(217)

七 高罗佩的古琴文化研究	(219)
(一)关于古琴	(219)
(二)高罗佩与古琴	(224)
(三)高罗佩关于琴文化的研究成果	(226)
(四)高罗佩琴学研究的得失	(231)
(五)小 结	(258)
八 高罗佩的东方性学研究	(262)
(一)高罗佩收集整理的性学研究材料	(262)
(二)高罗佩性学研究成果:《秘戏图考》、 《中国古代房内考》	(267)
(三)高罗佩研究的中国古代春宫画	(269)
(四)高罗佩春宫画的研究态度、策略方法及得失	(282)
(五)高罗佩春宫画研究对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290)
(六)高罗佩研究中国古代性与社会	(293)
九 高罗佩文化实践的启示	(328)
附录一:所用研究范本	(342)
附录二:《狄公案》小说中狄仁杰经历与作品对照表	(344)
附录三:高罗佩生平及其主要学术著作年表	(346)
后 记	(350)
致 谢	(353)